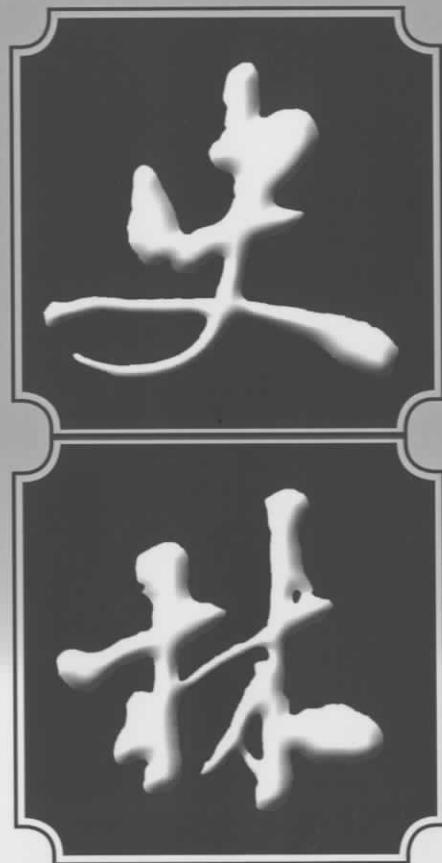


HISTORICAL REVIEW



2014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

目 录

城市史研究

近代上海名园爱俪园考辨

——以黄宗仰有关爱俪园的佚文等材料为中心

李军 (1)

论近代上海教育发展中的民间参与

施扣柱 (10)

专家的诞生:近代上海的大学教授

江文君 (21)

古代史研究

隋及唐前期江淮社会风俗的特点与转变

陈磊 (29)

皇权与信仰:唐武宗抑佛崇道原因新探

秦中亮

陈勇 (36)

朝鲜王朝对明朝薛瑄从祀的反应

王鑫磊 (44)

王圻父子《三才图会》的特点与价值

何立民 (54)

由动机与影响论定乾隆石经的性质

张涛 (60)

近现代史研究

同济医工学堂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

崔文龙 (69)

新文化源于教会论

——以张亦镜为中心

范大明 (81)

为普通读者群体创造“知识世界”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学术精英的合作

[美]高哲一 (92)

蒋介石、陈立夫与1948年行宪组阁的困局

贺江枫 (109)

当代史研究

扩展公私合营下的企业制度变革

张忠民 (121)

——以上海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为例

林超超 (133)

“大跃进”后的产能过剩与城市工业的增效改革

世界史研究

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地震与政府救助刍议

刘榕榕 (146)

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与以色列国家记忆场所的形成

艾仁贵 (158)

史学理论·综述

“科学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1917—1948)

胡成 (167)

身体、文本、权力与日常经验

——欧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果(2000—2013.7)

柳雨春 (178)

“全国第二届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徐有威 杨华国 (185)

英语摘要

葛鉴瑶 (189)

朝鲜王朝对明朝薛瑄从祀的反应

王鑫磊

[摘要] 薛瑄是第一个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1574年，薛瑄从祀孔庙的第三年，朝鲜王朝派往明朝的使节许筠、赵宪将有关薛瑄从祀的详细消息带回国内，并向国王上书要求将薛瑄纳入朝鲜孔庙从祀，最终未能实现，但薛瑄作为明朝从祀孔庙的第一位本朝先儒的示范意义，最终促使朝鲜完成了对本朝先儒的“五贤从祀”。朝鲜王朝选择坚持自身学术正统，并不惜在孔庙配享制度上与明朝中断一致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朝鲜王朝一种自主意识的体现。在处理明王朝与朝鲜王朝的关系问题时，这一事例提醒我们，比起一味地关注和强调两者间文化共性的一面，有些差异性的面向所传递出的信息，更值得关注和反思。

[关键词] 薛瑄；孔庙从祀；儒学正统；中朝关系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4)03—0044—10

[作者简介] 王鑫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0433

薛瑄(1389—1464)，山西平阳府蒲州河津县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应该说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学界对薛瑄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高潮，陆续有大量研究论著问世，^①而关于薛瑄从祀问题的讨论，目前所见似乎只有许齐雄的两篇论文和李海林的两篇短文有比较详细的讨论。^②本文将展示与薛瑄从祀有关的另外一个面向，即薛瑄从祀的消息通过一位出使明朝的朝鲜人许筠的记载而传到朝鲜半岛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响，进而揭开凡事“一遵明制”的朝鲜为何在孔庙配享上开始不再与明朝保持同步的那一段历史。

一 许筠其人

许筠，字美叔，号荷谷。出身名门，年仅18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生员试，22岁在科举中文科及第，后由朝廷“赐暇读书”，为出仕做准备。其间，他的表现在同期进士中堪称佼佼者，不仅经

^① 如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赵北耀主编《薛瑄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蒙培元：《薛瑄学术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演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郝星久：《薛瑄的教育思想》，《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魏宗禹：《薛瑄思想特点三论》，《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周庆义：《从孟、荀论性说观照薛瑄复性论》，《运城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徐远和：《薛瑄的“实学”思想探析》，《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姜国柱：《薛瑄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许齐雄：《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明清史集刊》2007年第9期；许齐雄：《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在官学和科举的结合——以薛瑄思想为例》，《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李海林：《薛瑄对程朱理学的体认与实践》，山西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马玉山；高琼：《生命践履与“通天性”——薛瑄哲学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丁为祥。

^② 许齐雄：《我朝真儒的定义：薛瑄从祀孔庙始末与明代思想史的几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许齐雄：《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晋阳学刊》2007年第4期；李海林：《薛瑄从祀孔庙缘由》，《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李海林：《关于薛瑄从祀孔庙的两个问题》，《兰台世界》2011年第28期。

常与李珥、柳希春等当世大儒同在经筵论道，还曾在国王主持的一次试射中三中夺魁，可谓文武全才。^① 1574年，朝鲜循例要向明朝派出圣节使（恭贺万历皇帝生日的使节），是年24岁的许筠主动上疏请求担任书状官（职责是记录使行经过并在归国后汇报）同行，获批前往中国。回国之后，许筠一度仕途亨通，先后担任吏曹佐郎、弘文馆校理、昌原府使等职。然而，1584年，朝鲜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弹劾李珥的党派之争，许筠因跟随其父立场（东人派）而成为弹劾派的先锋，站到攻击西人派李珥的第一线，这场政治斗争以东人派的失败告终，许筠也遭流放，尽管第二年他就被赦免，但已无心从政，自此开始了流浪生活。1588年，38岁的许筠因病卒于出游金刚山的途中。^②

许筠的英年早逝令当时朝鲜士人多为其扼腕，时有评论称“筠聪颖强记，诗词艳丽，一代推为才子。故时人宗之曰：吾侪虽失李珥，有美叔在，何损焉？筠亦傲然自当，立帜攻珥，以至于败，谈者惜之”。^③ 许筠的学识得到世人高度评价，还可从这样两个情节得到证明：其一是李珥弹劾案结束后，李珥本人甚至还因爱惜许筠的才华，在国王面前为这个抨击自己最厉害的青年后学求情。^④ 其二是许筠曾作为朝鲜政府的代表接待过一位明朝来的使节黄洪宪（1582年），在交流过程中，这位黄太史对他的评价是“使此子生于中华，玉署金马当让一头。”^⑤ 意思是说他即使与中国的文人学士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筠是朝鲜大儒柳希春的门人。柳希春精通经史，著述颇丰，尤擅理学，曾著有《朱子语类笺解》等。^⑥ 师从柳希春的许筠自然是受到了极好的儒学训练，特别是对朱子学有极深的造诣。23岁时他就多次奉旨“入侍进讲”，与李珥、柳希春等一起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宣祖大王讲读诗书经籍。^⑦ 他学宗李滉，重视道统思想，十分关心李珥编撰的《圣学辑要》。据其年谱记载，许筠著述有《朝天记》、《北边记事》、《荷谷粹语》、《仪礼删注》、《夷山杂述》、《读易管见》等，^⑧ 此外还编有《海东野言》、《伊山杂述》等书，就其短暂一生来说实属多产。

1574年，许筠出使中国之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书写整理成四卷本的《朝天记》，后收入其文集《荷谷集》中，故又称《荷谷先生朝天记》。^⑨ 熟悉朝鲜时期燕行文献的人大概都会了解，这部《荷谷先生朝天记》可算是产生于明代的使行文献中内容最详实、体例最完备的文献之一，而针对这一文献展开的研究也为数不少。^⑩ 正是在这部《朝天记》，留下了关于薛瑄从祀孔庙的相关记载。

①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六年（1573）四月二十九日（戊寅）条：“凡通政以下文臣及武臣二品以下试射……至日暮，科次，则许筠以三中为魁”。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韩]探求堂1963年版，第21册，第262页。

② 关于许筠的生平，可参见《荷谷先生年谱》，收在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58册，第485—486页。

③ 《朝鲜王朝实录》（宣修19卷）宣祖十八年（1585年）六月一日（庚子）条，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5册，第544页。

④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十六年（1583年）十月二十二日（庚午）条：“吏曹判书李珥入京肃拜。上引见慰谕后，传曰：‘予如汉元帝之为君，不能斥远小人，国几亡矣。’珥对曰：‘朴谨元、宋应旼固邪人也，许筠则年少轻亡，而非邪人也，其才华可惜也。此三人得遣太重，同罪之人，皆不自安，须从宽典。’”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408页。

⑤ “（许筠）以远接使李珥从事官，迎诞生皇长子颁贺诏使黄洪宪、王敬民于义州。二使俱服其文章，临别赠扇求诗，公一挥以进。二使击掌叹赏曰：‘佳作妙作’。黄太史谓译者曰：‘使此子生于中华，玉署金马当让一头’。”见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85页。

⑥ 柳希春的著述有《续蒙求》、《历代要录》、《续讳辨》、《川海录》、《献芹录》、《朱子语类笺解》、《诗书释义》等，编著有《国朝儒先录》。

⑦ 参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280页、296页、297页。

⑧ 参见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86页。

⑨ 该文献在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荷谷集》中有收录；在[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册中亦有收录；此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册，也收录了该文献，其版本为韩国奎章阁藏1707年木版印刷的重刊版本。

⑩ 如陈尚胜等所著《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就专门有一个章节讨论“许筠《朝天记》”；日本学者夫马进在其《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的第一章，也有对许筠及其《荷谷先生朝天记》的专门讨论；此外还有专文，如李豪润：《16世纪朝鲜知识人的“中国”认识——以许筠的〈朝天记〉为中心》，[日本]立命馆大学编《韩国研究》第2辑，2011年，第81—96页。

二 《南宫奏议》与薛瑄从祀

许筠来到中国之前的三年,即1571年,明朝在孔庙从祀问题上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即以本朝先儒薛瑄从祀孔庙。到了许筠出使的1574年,多数朝鲜人还并未知晓薛瑄从祀一事。有意思的是,许筠在这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在七家岭驿投宿明人刘九彝家时,因行程耽搁而翻阅严嵩所撰《南宫奏议》一书,见“中有《薛文清从祀覆议》,备载一时朝绅异同之论”,^①从而知道了此事。

1、明朝士大夫对薛瑄从祀的讨论

由于当时离薛瑄被准从祀不久,许筠觉得这篇记录1540年明代士人讨论薛瑄从祀的文献有一定的价值,于是专门将这篇《覆议》全文抄录下来。这篇《覆议》是严嵩等人将当时礼部收到的众多有关薛瑄从祀的不同意见进行摘要整理后,提供皇帝御览的文本。其中提到二十三人的赞同意见以及三人的反对意见,具体如下:

赞同者	意 见
尚书 霍韬	瑄造诣不及董仲舒,而诚笃似之;颖悟不及韩愈、欧阳修,而笃行过之;粹精渊醇不及程颢,而浑厚师之。从祀孔庙,薛瑄无愧。
侍郎 张邦奇	笃实足以砭伪,中正足以律偏,纯粹足以订杂。臣愚以为瑄当从祀无疑。
詹事 陆深	本朝以理学为宗者自瑄始,考其平生出处进退言论风旨,不合于圣人之道者鲜矣。从祀之选,非瑄不可。
少詹事 孙承恩	夫理学莫盛于宋,使瑄而生其时,未足多也,而在今日,则可无崇重乎?臣故以为祀之是。
祭酒 王教	瑄著述所存,固虽少让于前贤;德馨之美,亦足感发乎后学。以之从祀,未为不可。
学士 张治	纯粹可以正偏驳,笃行可以破浇漓,廉介可以厉贪鄙,恬退可以黜奔竞,惇大可以裕浅狭。薛瑄从祀之典,似不可缓。
府丞 胡守中	议从祀者,道德为重,著述为轻。当以天理人心裁之,而不当惑于浮议之私也。表章从祀,无出瑄之右者。
庶子 杨维杰	潜心孔颜,抗志程朱,若秩之从祀,实足以彰我朝人文之盛。
谕德 龚用卿	其人诚贤也,虽不必于著述可也。以瑄之贤而特允其从祀,主张斯文,实在此举。
屠应峻	崛然兴起,卓越自信,卒为本朝理学名臣称首。以之侑坐孔庭,且与古祭于瞽宗之义合。
洗马 徐阶	以身卫圣道,非徒托诸空言。诚祀瑄以示向往之端,示风励之意,其于圣化,亦岂小补。
邹守益	考其出处进退之间,不折节于权奸,不谢恩于私室,不曲法于贵近,不慑志于临刑,不濡滞于相位,一时翕然尊信,揆之于古,其近于狷者之流乎?进瑄从祀,以昭国家之盛,其于世教,未必无补。
中允 李学诗	瑄之专言性理纲常,如彼其醇也;修身以道,如彼其正也。以瑄侑食孔庭,揆之礼意,最为有得。
秦鸣夏	瑄独反躬实践,溯寻正脉,使学者晓然知所趋向。此其功诚不在著述下,进瑄而祀之,庶几继往开来,永光吾道。

^① 见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40页。许筠抄录的《薛文清从祀覆议》,载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40—442页。后文属该《覆议》内容的引文,注以“见《覆议》”。

赞同者	意 见
闵如霖	瑄生明盛之世，卓然有见，以居敬尽诚为学。进瑄从祀，实斯道之幸。
赞善 阎朴	体认精详，造诣深粹。昭代之士，曾无瑄若者。不瑄之祀，而谁祀哉？
司直 谢少南	从祀孔庙，当论其学术之醇驳，不当论其著述之有无。国家真儒，宜以瑄为第一。进瑄从祀，实协公义。
吕怀	其学已有诸己，寝寢乎笃实而有光辉。特加从祀之典，则鼓舞感孚，将不有振刷兴起，因流求源，以上继往圣之传者哉。
编修 王同祖	瑄言行笃实似许衡，出处峻洁过杨时。以之从祀，诚为无忝。
赵时春	言必底绩，行不愧心。如瑄者，百年以来，实难其人。是亦圣人之徒从圣人之祀，于理为当。
唐顺之	瑄之可附于祀典者有四，无歉于祀典者有二，宜如臣瞻、臣得仁所疏。
黄佐	瑄之诵法著述与其躬行，于孔子之道无愧焉。列之从祀，于典礼为宜。
侍读 胡经	举瑄而从祀之，俾经生学子，在于敦行而不在乎多言，务于实胜而不贵于虚谈，则吾道幸甚。
反对者	意 见
庶子 童承叙	程朱高第如罗从彦、李侗、尹焞、黄幹，尚未得祀。近时儒者如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亦应从祀。舍彼取此，似为未遍。莫如姑缓，以俟将来。
赞善 浦应麒	如董仲舒、韩愈、王通诸人，亦各旷千古而后始定，虽以俟后世可也，是以瑄为不必祀。
郭希颜	瑄可为一时之豪杰，而不可谬称理学之宗支；可享一方之明禋，而不可滥叨圣门之礼乐。臣请莫若罢之便。

(笔者按：上表据许筠《朝天记》中抄录之《薛文清从祀覆议》内容整理)

在概述了士人的意见之后，严嵩等人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臣等切惟光岳气分，世无全士，度长絜短，自有可观。薛瑄之造诣，其视宋儒，虽若有间，然实为本朝理学之倡，必若从祀，无以逾瑄。臣等推仰先哲之心，与诸臣一也。乃若与弼诸人，亦皆为一时士论之所推许。但时同地近，臣等难以轩轾抉择于其间矣。夫众言析诸圣人，议礼本诸天子，仰惟皇上神谟圣学，卓越千古，顷者诸所祀典彝章，悉加裁正。诚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也。惟兹孔庙之祀，关系万世，天下之所仰瞻，实为重大。臣等愚昧，不敢轻议，伏乞圣明特赐睿断。(见《覆议》)

当时，嘉靖皇帝对这篇《覆议》的批复是：

圣贤道学不明，士习趋流俗，朕深有感焉。薛瑄能自振起，诚可嘉尚，但公论久而后定，宜俟将来。(见《覆议》)

薛瑄从祀孔庙的建议，从其去世之年(1464年)起，就有人提出，此后一直绵延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在这篇《覆议》产生的嘉靖十九年(1540)，由当时的礼部主导，对薛瑄从祀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讨论，仅从这篇《覆议》来看，当时多数士人倾向于同意薛瑄从祀，但最终这次议论的结果还是由于薛瑄著述不多以及“时同地近”这两大争议点，而未形成定论，此后又经过了三十一年，即到了1571年，薛瑄才被批准正式从祀孔庙。而研究者分析薛瑄最后之所以成功从祀的原因，多指向三个方面，一是明中期以后阳明学的兴起对朱子学产生冲击，理学支持者希望通过一种“表彰正儒”的方

式,来重新强化理学传统的权威,于是薛瑄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二是最后主持讨论并决定薛瑄从祀的当权派中,不少都是薛瑄的乡党,他们的帮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点则是,当时有一位叫李濂的士人,通过私人论著从学理上解决了“著述多寡不能作为从祀与否的单一标准”的问题。^①

现在学者讨论薛瑄从祀的问题,以许齐雄的研究为例,主要运用的文献资料是官员奏本、礼部奏章、实录资料以及文人文集等,这都是正确的方向。而许筠抄录《南宫奏议》中的《薛文清从祀覆议》一事,可以说又为研究薛瑄从祀提供了一种新的文献线索,我们无法说这些记录是全新的资料,因为《南宫奏议》本就是中国固有的文献,但是如果没有许筠的抄录和呈现,研究者大概不会想到去《南宫奏议》里寻找薛瑄从祀的相关资料,这大概就属于通过异域的眼光反观自身而获得史料线索的意外收获。

2、许筠对严嵩按语的隐忧

许筠作为程朱理学的支持者,对明朝士人高度评价薛瑄功绩以及薛瑄最终成功从祀孔庙,自然是表示了乐见其成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表示:“然文清祀典,卒定于近日,可见公论之不终泯也。”^②然而,在抄录《南宫奏议》的过程中,他还是隐隐发现一些危险的信号,让他对薛瑄从祀一事产生了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

许筠在《南宫奏议》的《薛文清从祀覆议》中,看到严嵩写的一条按语:

又看得尚书霍韬奏内,欲将宋臣司马光、陆九渊议黜从祀。夫司马光平生所学,惟是濮王之议,失父子之伦,委为昧礼。若其公忠鲠亮,勋业伟峻,为宋一代名臣,无问贤不肖,皆知尊信,似未可以一眚病之。陆九渊资稟高明,见道超悟,其学术论议当在薛瑄之右。今议进瑄,则九渊似难遽罢。(见《覆议》)

因看到尚书霍韬在表彰薛瑄的奏章中,同时提到希望将司马光、陆九渊二人取消从祀的建议,严嵩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认为霍韬主张取消司马光从祀,大概是因为他曾有濮王之议,而司马光一生中,除了濮王之议为人诟病之外,其他方面都还是好的,并不至于要取消其从祀资格。而对于陆九渊,严嵩的评价甚高,认为其学问胜过薛瑄,并表示:如果霍韬觉得薛瑄可以从祀,那陆九渊的从祀资格就很难取消。

许筠对严嵩的这番论述有自己的看法:

霍韬请黜九渊则是矣,而欲并去司马公者,专指濮王议一事而言,此韬之附会奸计也,其亦可唾也夫。矧嵩之以司马公濮议,为昧父子之伦;跻九渊于文清之右,以为不当罢者。尤足以见嵩之心术也。^③

显然,许筠对霍韬所提取消陆九渊从祀这一点是持赞同观点的,但他反对霍韬的将司马光去祀的意见,可见,许筠是司马光濮王之议的支持者,这大概也代表了绝大多数持道统论的朝鲜学者的立场。至于对严嵩的评价,许筠认为其将司马光的濮议看做昧父子之伦的观点并不正确,此其一;而对其把陆九渊的地位置于薛瑄之上,许筠自然就更为不满。由此,他认为严嵩是心术奸猾之人,但更让他担心的是,在三十多年前,如严嵩这样的高官都已是心学的拥趸,理学在明朝的发展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对于严嵩抬高陆九渊的学术这一点,许筠还有更大的担忧:

陆九渊之从祀则嵩之他文有曰,在于嘉靖九年,而我国人全不闻知,诚可惊骇。然则迩来之旅请从祀王守仁者,实本于此而发也欤?堂堂圣庙,本为崇德报功以淑人心,而今乃杂以异学之流汚之。此实我中朝之一大阙典也。^④

许筠提到陆九渊从祀的问题,他指出,从严嵩《南宫奏议》的其他文章中看到,陆九渊早在嘉靖

^① 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前引许齐雄、李海林的文章。

^② 见许筠:《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42页。

^③ 见许筠:《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42页。

^④ 见许筠:《朝天记》,收在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册,第442页。

九年(1530)就已经从祀孔庙,对此他深表惊骇:陆九渊四十四年前就已经从祀孔庙,但朝鲜方面竟全然不知。其实朝鲜方面倒也不是全然不知,只是确实知道得很晚,在许筠出使的三年前,许筠的老师柳希春就曾向朝鲜国王提到过陆九渊从祀,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在朝鲜因为没有被大规模地讨论,所以许筠和多数朝鲜士人一样,还并不了解。由陆九渊的从祀,许筠进一步联系到王阳明从祀的问题,他认为当时明朝之所以有很多人提请让王阳明从祀,就是因为有陆九渊从祀的先例在。而自此陆九渊之后,心学者从祀孔庙的大门已经洞开,堂堂圣庙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心学异说的污染。

许筠对于陆九渊开创了心学者从祀先河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确实为后来的王阳明从祀扫清了一半的道路,而这大概也是当时明朝的心学支持者为最终实现王阳明入祀而采取的一种铺垫策略。既然心学者可以从祀孔庙,那么王阳明就学术和功绩而言,已经完全符合从祀的标准,剩下的唯一棘手问题就是“时同地近”或者说“世代稍近”。王阳明是1529年去世的,一般从祀孔庙都需“公论久而后定”,薛瑄从去世到从祀经过了一百零七年,已经算是相当之快了。但我们知道,王阳明最后是在1584年确定从祀,即在他去世后的第五十五年,在当时来说是创造了一个从祀孔庙的最快纪录。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也正是薛瑄的从祀为王阳明的从祀扫清了另外一半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说?薛瑄从祀算是开启了本朝人从祀的先河,而在有了“本朝人亦可从祀”的先例之后,时间条件也慢慢不再成为从祀孔庙的硬性标准。如果再回过头去看,当时在薛瑄从祀的问题上,士人意见呈现令人惊讶的一边倒情况,心学派非但没有太多反对,甚至还助推之,亦是薛瑄成功从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背后,很难说不是心学派希望通过薛瑄的从祀,解决“世代稍近”的时间难题,从而为王阳明从祀铺平道路。由此观之,第一位明儒理学家薛瑄的从祀孔庙,真的如有学者所认为的,是所谓理学对心学的一次胜利吗?其亦未尽然矣。

三 薛瑄从祀在朝鲜引发的反响

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有孔庙从祀制度,但两者从祀安排并不相同,一方面表现在朝鲜除从祀中国先贤先儒外,也从祀本国先儒如崔致远、薛聪等所谓“东国十八贤”。^①另一方面,即使是其中从祀的中国先儒,亦不尽相同,因袭与差异并存。朝鲜王朝前期,朝鲜孔庙从祀的中国先儒大体随中国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但其间往往会出现中国方面的变动信息不能及时传递到朝鲜的情况。最初,尽管消息滞后,朝鲜还是会相应进行增补。^②然而,明朝弘治年间以后出现的从祀变动,朝鲜方面就没有再跟从,这背后明代心学兴起和心学者从祀个案的出现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原因。总的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两者在孔庙从祀差异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目前韩国文庙基本上已经取消对中国先儒的从祀。^③而1574年许筠等朝鲜使臣的使行记中留下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正折射出这一差异最初出现时的那段历史。

① 所谓“东国十八贤”计有:崔致远、薛聪、安珦、郑梦周、金宏弼、赵光祖、李滉、郑汝昌、李彦迪、李珥、成浑、金长生、宋时烈、宋浚吉、朴世采、金麟厚、赵宪、金集。

② 如明宣德十年(1435年)以元儒吴澄从祀孔庙,正统二年(1437年)以宋儒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庙,朝鲜成宗九年(1478年)始知中国此事,令千秋使到明朝国子监询问,十二年即“依中朝之制,以先儒吴澄、真德秀、胡安国从祀孔子庙”。参见孔祥林:《朝鲜的孔子庙——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象征》,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1期。

③ 目前韩国成均馆大成殿内主祀孔子,以颜回、子思、曾参、孟子东西配享,孔门十哲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和宋朝六贤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朱熹以及东国十八贤分别东西从祀。其他地方的乡校均供奉孔子、四配、东国十八贤,有的还奉祀孔门十哲、宋二贤(程颢、朱熹)、三贤(程颢、程颐、朱熹)、四贤、六贤。比较特殊的是江陵乡校和全州乡校,前者奉祀人物最多,有孔子、四配、宋六贤(大成殿内)、中国九十七位先贤先儒和东国十八贤(两庑内),后者无九十七位先贤先儒,却单独奉祀有若、宓不齐、伏胜、董仲舒、韩愈、司马光、李侗七位先贤先儒(两庑内)。参见前引孔祥林:《朝鲜的孔子庙——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象征》。

1、朝鲜孔庙从祀薛瑄之议

许筠一行回到朝鲜，带回了有关薛瑄从祀的最新消息。事实上，许筠等人并不是最先将这一消息带回朝鲜的人，在此前，1572年使行的许震童、1573年使行的尹根寿，都在参观北京国子监时看到了薛瑄从祀的情况。^①但是，如果说此前只是简单的消息传递，那么这一次许筠的贡献，就是他抄录《薛文清从祀覆议》的举动，实际上是将有关薛瑄从祀的经过和明朝士人对薛瑄的评价等详细资料带回了朝鲜，而这些资料也成为后来朝鲜人讨论薛瑄是否应在朝鲜从祀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虽然许筠所做的只是记录了明朝人对薛瑄从祀的讨论文字，但这一举动背后实际是一个跟随文献流传而实现思想资源传播的过程。

照理说，朝鲜的孔庙从祀大体应该追随中国的变化，所以与许筠同时前来中国的赵宪，在回国后向国王提交的《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中，专门论及“圣庙配享之制”，列举出当时朝鲜孔庙与中国孔庙在中国配享上的不同：

臣又按东西庑之列。林放、蘧瑗、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何休、贾逵、郑众、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范宁、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等不在其中。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杨时、陆九渊、薛瑄等皆与于列。^②

从赵宪的观察可以看到，当时朝鲜仍然从祀但明朝已经不再从祀的先贤先儒，其数已达二十人之多，而明朝新列入从祀朝鲜未及增补的，也有七人。事实上，在赵宪所记七名新增从祀者中，杨时早在1495年就已从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等人也是在1530年从祀，这些情况朝鲜国内早已有过讨论。^③只有一个薛瑄，算是最新的变化。

此前朝鲜孔庙的从祀，基本上还算是紧跟中国的变化，但这一次使行考察下来的情况，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有明一代孔庙从祀的变化之大。面对这一变化，赵宪一一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并认为绝大多数的变化都可接受，“我朝似当讲究而从之者也”，唯独对陆九渊的从祀，他提出坚决的反对，认为“恐不可效尤而苟从也”。^④同时，在明朝最近新增的从祀者中，赵宪又对薛瑄至为推崇：

薛瑄奋乎绝学，笃志力行，迨其道成德立，进仕于朝则高风大节，砥柱乎奔流，退而讲学则只句微言，日星乎中天。臣窃观吕柟所记《薛文清祠堂记》，则其人学行之高，概可想矣。故臣敢具雁于后以进，如或前颁《读书录》之中未及载印，伏愿以此还下于校书，命印而颁之，使一时学者咸得观感，则以之从祀而人知景仰矣。（先生追注曰：是年□月□日，传于校书馆，印出《读书录》，再并令附印斯记于篇首。）^⑤

由此我们看到，当时朝鲜官方已经有颁印薛瑄代表作《读书录》的打算，只是还没有印出，而赵宪建议将吕柟所写的《薛文清祠堂记》附于该书篇首，得到了批准。同时，赵宪也向国王表达了应该将薛瑄列入朝鲜圣庙从祀的意见。已经从祀孔庙的薛瑄，是被中国官方认可的“明儒第一人”，而且他是理学家，照理应该受到朝鲜士人一致好评，其从祀朝鲜孔庙似乎不成为一个大问题，可事实却并非如此。除了赵宪回国后提交的《八条疏》中提到的建议之外，短期内朝鲜几乎没有更多主张薛瑄从祀圣庙的议论出现。

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朝鲜真要以薛瑄从祀，势必要面对当时中、朝孔庙从祀中总共有二十七人存在出入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仅将自己最有好感的薛瑄一人从祀，而不顾其

^① 许震童：《东湘集》，收在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3册，第589页；以及尹根寿：《月汀集》，收在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47册，第232页。

^② 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4册，第185页。

^③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四年（1571）十二月三日（辛卯）条中，即有柳希春进言明朝从祀变化：“中朝嘉靖中，黜荀况、马融、刘向、贾逵、何休、王弼、戴圣、王肃、杜预，而以王通、欧阳修、胡瑗、杨时、李侗、胡安国、陆九渊、蔡沈、真德秀从祀。此时王之制，且不无意，请从之”。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238页。

^④ 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4册，第185—186页。

^⑤ 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4册，第185—186页。

他。而如果要考虑全部按照当时明朝的从祀者进行变更，又会面临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陆九渊怎么办？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维持现状。而当时朝鲜人尹根寿的一番话，可以说为朝鲜这样一种以回避麻烦为目的而维持现状的做法找到了一条极好的借口：

试以吴澄祀黜一事言之，澄之从祀，在于正统，而我国不之知，其黜在于嘉靖，而我国今始知，凡嘉靖以后从祀升黜，未允于人心者，岂无后日之公论而或有改之，如吴澄之升黜者乎？此尤可待公论之定，而未可一一遽从者也。^①

尹根寿其实是给出了这样一种想法：他以吴澄为例，指出其在明朝正统年间（1435年）从祀，当时朝鲜没有马上知道，等到朝鲜终于跟进从祀之，其又于嘉靖年间（1530年）被罢祀，而他被罢祀的消息朝鲜又是很晚才知道（1571年）。明朝的从祀罢祀，变化太快，特别是嘉靖以后从祀之人，也不知道今后会否和吴澄一样的命运。所以朝鲜不如等待其经过时间检验、形成定论后再说，而不必马上跟从。

2、薛瑄从祀与朝鲜的“五贤从祀”

表面上看，包括薛瑄从祀在内的一系列明代新增从祀，不再对朝鲜的孔庙从祀状况产生即时性的影响，但如果深入去看，就会发现薛瑄从祀对朝鲜的从祀制度还是有不小影响的。要理解这一点，不应该把目光聚焦在朝鲜是否从祀薛瑄的问题上，而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即薛瑄从祀是明朝从祀本朝先儒的先例，这一点对朝鲜有着不小的触动。

朝鲜孔庙除了从祀中国的先贤先儒，也从祀本国先儒，但在当时，朝鲜孔庙中从祀的本国先儒只有崔致远、薛聪、安珦、郑梦周四人，都是前朝的儒者。早在朝鲜中宗十二年（1517），朝鲜士人在提请从祀前朝儒者郑梦周的同时，就已经提出过从祀本朝先儒金宏弼，^②但最后郑从祀（1517年）而金未从祀。其后，朝鲜又陆续出现要求从祀本朝先儒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的呼声。到了1573年，又进一步形成以本朝先儒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等五人从祀孔庙的建议，即所谓“五贤从祀”之议，^③从时间上看，正好在薛瑄从祀的消息传到朝鲜之后。可见，朝鲜士人要求从祀本朝先儒的建议由来已久，但迟迟不被采纳，而明朝从祀本朝先儒薛瑄的事例，无疑给“五贤从祀”增加了一个砝码。1574年，赵宪回国后递交的《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中的部分论述，大致也体现出这一点：

臣愚。又因中朝从享之事，而深有所感焉。盖士习之趋，一视其上好之所在，而殿下倾于馆学儒生，诸贤从祀之请，屡陈而不允，近臣经席之启，亦不领可，是实沮一世向善之心也，臣窃闷焉。夫金宏弼肇倡道学，而有继往开来之业；赵光祖继明斯道，而有拯世淑人之功；李彦迪体道纯笃，而有扶颠持危之力。兹三人者，求之中朝，则许衡、薛瑄之外鲜有伦比。而求之东方，则薛聪、崔致远、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见到处者。况如李滉，集东儒之大成，而绍朱子之嫡统，进则引君当道之诚，恳恳乎章疏之间，退则因才设教之意，切切于讲论之际，善者闻言而景慕，恶者望风而自戢。……况此金宏弼四君子，所当从祀之议，朝无异言，士无异论，而尚此迟留者，谓斯人为不贤乎？伏愿殿下，亟奖四贤，列于从祀。^④

赵宪表示，自己看到中国孔庙从祀的变化（其中当然是包括薛瑄从祀一事）深有感慨，再联想到近来国内儒生多次请求从祀本国诸贤而不允的状况，心中甚是苦闷。然后他一一表彰金宏弼、赵光

① 尹根寿：《月汀集》，载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47册，第232页。

② 《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十二年（1517年）八月七日（庚戌）条“成均生员权镇等上疏”，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15册，第308页。

③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六年（1573年）八月二十八日（乙亥），“昨日儒生等上疏，大概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及李滉从祀文庙”；次日，二十九日（丙子），“儒生上疏以金宏弼等五贤从祀，再度上疏”。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269页。

④ 赵宪：《质正官回还后先上八条疏》，载前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4册，第186—187页。赵宪上疏一事，亦见于《朝鲜王朝实录》（宣修8卷）二年（1574年）十一月一日（辛未）条记载，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5册，第451—452页。

祖、李彦迪三人之功绩，称其“求之中朝，则许衡、薛瑄之外鲜有伦比”，然后又专门着力表彰李滉。最后指出，此四人从祀，“朝无异言、士无异议”，希望国王马上批准他们从祀。

虽然赵宪在这里提到的只有“四贤”，而非当时儒林普遍提出的“五贤”，但总的来说，他是借着汇报中国从祀变化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告诉国王明朝已经让本朝先儒薛瑄从祀孔庙这一事实，欲劝服其早日允许朝鲜本国先儒入祀圣庙。遗憾的是，赵宪的请求仍然没有马上得到应允。不过，在赵宪上疏之后，朝鲜国内关于本朝“五贤从祀”的呼声再度高涨，^①只可惜此事在宣祖一朝始终未得到解决，直到光海君二年（1610）才最终得以实现。^②可见，薛瑄从祀的消息传到朝鲜后，尽管薛瑄从祀朝鲜孔庙一事有议而无果，但却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推动了朝鲜从祀本朝先儒的讨论的升级，而其结果就是朝鲜“五贤从祀”的最终实现。

四 足征难循：朝鲜孔庙配享不尊明制的背后

在孔庙配享上，朝鲜起初一直遵循明朝的变化，最后一次随明朝而变动的情况发生在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即明成化十七年，增加了吴澄、胡安国、蔡沈、真德秀等人的从祀。然而，在此之后，明朝孔庙先儒从祀的所有变化，朝鲜都没有再行跟从，包括1495年的杨时，1530年的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1571年的薛瑄，1584年的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乃至其后所有的先儒从祀。一向极为推崇明朝的朝鲜，为甚么在这件事情上一反“一尊明制”的态度，其背后的原因，从薛瑄从祀这件事情上大概可窥见端倪。

除了前述有关薛瑄从祀在朝鲜引发的反响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情况：继薛瑄从祀之后，明朝又于1584年增加了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三人从祀，此事再次引起朝鲜大规模讨论，而其焦点都在对王阳明、陈献章两位心学者从祀的批评上。此时，薛瑄则又被朝鲜人拿出来作为一个该当从祀的正面典型，用以批判王、陈以及之前的陆九渊的不当从祀。此后，朝鲜礼曹甚至还曾有过这样的建议：增加明弘治以后新增的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薛瑄、胡居仁等人从祀，但拒不增加陆、王、陈三人，^③似乎这样才可以表明朝鲜捍卫道统和理学的立场。

总的来说，薛瑄从祀一事，在朝鲜引发一些后续反响，包括薛瑄是否从祀朝鲜孔庙的讨论、激起朝鲜“五贤从祀”议论的升级，以及后来重新被发掘出来批判王阳明等人的从祀等等，这些讨论的背后，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朝鲜对待心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态度问题，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朝鲜不再遵循明朝孔庙先儒从祀的最关键原因。

薛瑄从祀在朝鲜引起的反响，表面上看是从祀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儒学思想差异问题。就当时而言，朝鲜“卫朱斥王”（尊朱子学而排斥阳明学）的立场，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国内以李滉为主导的批判自不必论，朝鲜士人出使中国时与明朝士人激烈论辩阳明学为伪学的，亦有许筠和西厓柳成龙的二人的例子。而壬辰战争中，明朝派往援助朝鲜的将领宋应昌、袁黄要求朝鲜国王在全国上下讲授阳明学说，遭到朝鲜士人的强烈反对；战后又有明人将领杨镐、万世德等要求朝鲜孔庙从祀加入陆、王二人，亦遭朝鲜上下反对而未果。^④

^①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573年到1610年的三十七年间，仅《朝鲜王朝实录》中明确记载的各级士人上疏提请“五贤从祀”的情况达十七次之多。

^②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二年九月五日（丁未）条，“教中外大小臣僚、耆老、军民、闲良人等以从祀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等于文庙，下教书曰”，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31册，第564页。

^③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四年（1626）闰六月二十四日（甲子）条，“礼曹启曰：……后苍、杨时、王通、欧阳修、胡瑗、薛瑄、胡居仁，升祀宜矣。而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其识见之超越，论议之豪迈，固已高出汉、晋诸儒之上，唯其见太高、守太固，至比朱子之学于洪水、猛兽之害。门路既差，流为异端，似难尊崇圣庙，以误趋向云。”见前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34册，第119页。

^④ 参见张崑将：《十六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以许筠与袁黄为中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期，2009年5月。

朝鲜为何如此尊崇朱子学说而极力排斥阳明学说？张崑将教授在其一篇论文中指出，这或许和一种强烈的“文化正统意识”有关，他将这种“文化正统意识”联系到朝鲜的“小中华意识”，认为当时朝鲜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旦“中华”“不华”之后，朝鲜就要肩负起“华者”角色使命感，所以才要极力维护朱子学这一“中华正统”，^①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见解。

而笔者同时也认为，这个问题大概还可以在朝鲜儒学思想的内部找到答案。在朝鲜的儒学发展史上，道统或者说正统是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支撑整个朝鲜儒学体系的基石，更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也延伸到社会其他各个层面，是一种笼罩性的观念。而就儒学本身来说，朱子是正统，阳明是异端，如果允许这个异端动摇了正统，则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儒学这一基石开始，维系整个朝鲜社会的理论架构亦会随之逐级崩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朝鲜儒者极力排斥阳明学的背后，也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正统或者说道统根基被动摇的哪怕一丝风险。

不难想象，朝鲜在了解到薛瑄从祀的情况后，首先自然是对于这样一位理学者受到表彰表示极为欢迎的态度，同时也会认为薛瑄从祀对倡导理学的朝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要具体落实到是否将薛瑄在本国从祀的问题上时，却面临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即心学者陆九渊已在薛瑄之前从祀，而如果说朝鲜从祀薛瑄是遵明制，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同时补上陆九渊的从祀，但是心学者的从祀，在朝鲜来说是绝不允许发生的。因此，薛瑄从祀，最后只能在朝鲜成为一个足征而难循的个案。而以此事件为标志，朝鲜在孔庙先儒配享这一点上，就开始和明朝分道扬镳了，不仅如此，这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双方在儒学观念上走上差异化道路的开始。

16世纪发生的明朝与朝鲜之间在孔庙从祀问题上走向分化的这一幕，促使我们思考，在所谓的朝贡体制下，作为附属国的朝鲜对于宗主国明朝的文化认同程度究竟如何？在一般认为以儒家义理为纽带而紧密联系的明朝和朝鲜之间，竟然在孔庙从祀这一重要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朝鲜的“一遵明制”亦由此出现了一个鲜明的反例。由此观之，所谓的文化认同，似乎只是一个笼统的用于概述我们愿望中状态的词汇，一旦进入到细节的层面，往往经不起个案的推敲。在考虑历史问题时，还是应该慎用“认同”这样一个词汇，因为任何一种概括的背后，都有一个消减的过程，而许多历史的真实，往往存在于这些被消减的细节之中。

[本文为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海外与本土儒学研究的交错与展望》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1RWXKZD010。]

(责任编辑：张晓东)

^① 参见张崑将：《十六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以许筠与袁黄为中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期，2009年5月。

史林

(双月刊)

2014年(第3期) 总第147期

主管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出版单位 史林编辑部
主编 熊月之
装帧 傅惟本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837室
邮政编码 200235
电话 021-64862266*28372
传真 021-64274175
互联网址 www.historyshanghai.com
电子信箱 shilin33@sass.org.cn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105/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7-1873
发行范围 国内外发行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发行单位 史林编辑部
印刷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4年06月20日
定 价 20.00元

ISSN 1007-1873



06>